

当代世界的不同解读

刘德斌

[摘要] 冷战后世界形势的剧烈变化使人们对当代世界的认识陷入迷惑之中,同时也促进了人们对当代世界的不同解读。这些解读不仅出自国际关系学家和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而且也出自西方主流媒体的专栏作家或观察家,后者的观点往往更为轰动,更具影响力。对当代世界的解读能力也是一种对当代世界的塑造能力,一个概念的创造和流行能够影响许多人对世界的看法和认同。分析和比较近年来不同专业、不同国家和社会背景的人对当代世界的不同解读,有助于丰富我们对当代世界的认识,锤炼我们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时代观和世界观,提出更多我们对当代世界令人信服的判定和主张,构建影响世界的话语权。

[关键词] “帝国”世界;后美国世界;跨国国家;国家构建;新兴大国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07JJDGW 252)

[收稿日期] 2010 - 01 - 19

[作者简介] 刘德斌,吉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教授,法学博士。(长春 130012)

近年来,世界经济与政治形势的剧烈变化使人们对当代世界的认识再次陷入迷惑之中,同时,解读当代世界的各种努力和观点也层出不穷。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媒体,无论是为了指点迷津还是为了哗众取宠,每逢重大事件发生,都有人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式,对当代世界给出新的定义和主张。波及全球的金融海啸和经济危机未等结束,“后危机时代”一词就已经成为许多媒体和学人定义当下的通用语了。曾几何时,“后冷战时代”是被多数人所接受的定义苏联垮台后世界的共识,但如果用它定义当前的世界经济和政治形势就显得“僵化”和“过时”了。“后 9·11 时代”、“后西方时代”、“后美国时代”似乎更贴近今天的现实。笔者曾在 2002 年发表过《“后冷战时代”的推测与判定》^[1],无疑,2002 年之后世界局势的发展变化已经超出了那篇文章讨论的内容。如果说《“后冷战时代”的推测与判定》还把讨论的重心放在国际关系领域的代表性观点,那么今天我不得不用“当代世界”来涵盖我要讨论的内容,并且把非国际关系理论家的观点纳入我们的视野,因为传统意义上的国际关系已经消失在当代世界的转变之中了。

所谓“当代”并非“现代”中离我们最近的那一段时期。“当代史是随着变化而开始的,但这种变化不是一般的变化,而是使我们或迫使我们认为我们已经进入一个新时代的那种变化。”^[2]^[12]当今世界的“变化多于传承”^[3]^[12]。本文就是想在梳理当代世界不同解读的基础上,对当代世界解读进行一番简单的概括和总结,以期促发中国学人对这种研究和讨论的兴趣,锤炼我们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时代观和世界观,提出更多我们对当代世界令人信服的判定和主张,构建影响世界的话语权。无疑,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题目,本人学力所限,难免挂一漏万,论列浅显。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涉及的“当代”,是从冷战结束时起。

一、当代世界的五种解说

人们对当代世界的解读始于苏联解体后对“后冷战时代”的解读，最初具有轰动影响的观点大多出自学术界。如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历史终结论”、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的“文明冲突论”、查尔斯·克劳森莫尔（Charles Krauthammer）的“单极时刻论”等等。但进入21世纪后，世界局势的发展变化已经难以用这些人们耳熟能详的国际关系学界的“判定”来解读了，而一些非学术界非国际关系理论界的观点却大行其道，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相关出版物成为流行世界的畅销书，“侵占”了国际关系理论家们的话语权。这些在西方的畅销书在我国也具有相当的影响。在这之中，笔者认为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世界是平的”、“帝国”世界、“地区构成的世界”、“后美国世界”和“不确定的世界”。

“世界是平的”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的《世界是平的：21世纪简史》畅销全世界，应该是解读当代世界的一部“经典”。尽管其观点也招致许多人的非议，但不可否认的是，他能用最为形象的语言和生动的故事把全球化冲击下世界经济、政治与社会的变革阐释出来。他认为，随着柏林墙的倒塌，冷战体系为全球化体系所取代，而这一变化的最大的动力来源于互联网技术的应用与普及。在碾平世界的十大动力中，他详细介绍了互联网技术的发轫、扩展与影响，国家之间、公司之间乃至个人之间的距离如何被互联网所抵消。当然，世界是平的并不意味着世界进入平等的时代，而是进入平等竞争的时代。在弗里德曼看来，世界变平是一个历史演进的潮流与方向，变平也是全球化的根本动力所在。他认为全球化经历了三个阶段：在全球化1.0时代，航海技术打破了国家之间的隔绝，将各个国家与民族连为一体；在全球化2.0时代，通讯技术的进步推动了跨国公司的大发展，全球公司处于同一竞争平台；在全球化3.0时代，网络技术将个人带入全球化的大舞台。^{[4]18-9}

“帝国”世界 2000年，意大利著名哲学家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和美国比较文学教授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出版的《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一书，对当代世界的解读具有相当的震撼力，在各国学术界引起轰动。他们认为：“帝国正在我们的眼前浮现。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当殖民制度已被舍弃，苏联对资本主义世界的市场的障碍最终坍塌，我们已经见证了经济和文化方面交流的不可抗拒、不可扭转的全球化。伴随全球市场和生产的全球流水线的形成，全球化的秩序、一种新的规则的逻辑和结构，简单地说，一种新的主权形式正在出现。帝国是一个政治主体，它有效地控制着这些全球交流，它是统治世界的最高权力。”^{[5]1}他们所描绘的“帝国”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帝国，而是“继民族国家的主权之后接踵而来的一种新型的主权”^{[6]168}。他们的《帝国》与其说是一种帝国理论不如说是一种全球化理论。在他们看来，帝国不是一种国家形态而是一种新的全球秩序，在这种秩序之下，民族国家并没有消失，而是成为“帝国”的一部分。帝国是一种新型的统治形式，它不仅寻求对人民的政治控制，而且还进入心灵空间，势必会遭到民众的反抗。帝国没有边界，因为它已经覆盖全球，因此，对帝国的反抗必然来自帝国治下的民众。至于如何反对帝国，两位作者并没有给出切实可行的建议。

“地区构成的世界” 地区化是冷战后世界经济与政治形势变化的一个趋势，“地区构成的世界”可能是最能被人们所接受的对当代世界的一种描述。但卡赞斯坦眼中的“地区构成的世界”却有所不同。彼得·卡赞斯坦（Peter J. Katzenstein）是康奈尔大学政治学教授，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他的“地区构成的世界”是与美国的“帝权”联系在一起的，“这个世界深深地嵌入了美国帝权之中”^{[7]1}。他认为，美国帝权（imperium）通过整合其领土和非领土权力的行动，对世界各地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些地区在制度形式、认同类型、内部结构等方面均有不同。日本和德国是亚洲和欧洲的核心国家，一直是美国权力和目标的支持者，拉美、南亚、非洲和中东等地区则没有这样连接美国和本地区的桥梁国家；在美国政策的推动下，全球化和国际化两个进

w. n

力。面对冷战后的世界，他认为历史学家的主要功能，“除了记住其他人已经忘记或想要忘记的事情之外，就是尽可能从当代的记录中后退，而以更宽广的脉络和更长远的视野去观看与理解”^[101]。他深刻地指出：“我们无法谈论这个世界的政治未来，除非我们牢牢记住，我们正在经历的这段历史，也就是人类生活和社会的改变历程，以及人类对全球环境所造成的冲击，一直是以令人眩晕的步伐加速进行……从上一个世纪中期开始，我们就已进入世界史的一个新阶段，这个新阶段终结了我们先前所知的历史，那个超过一万年以上的历史——亦即，从定居农业文明以来的历史。我们确实不知道，自己正在走向何方。”^{[101]18}

霍布斯鲍姆也对冷战结束后地区冲突的此起彼伏忧心忡忡。他认为，随着苏联的解体，意味着主导了将近两个世纪的国际关系强权体系已不复存在，等于是把内战和武力干涉其他国家事务的主要防线给移除了——在冷战时期，疆界通常是无法跨越的。当今世界日渐分裂为两类国家：一类是有能力有效管理其领土和人民的国家；另一类是没有能力管理其领土和人民的国家，而这类国家越来越多，它们被束缚于官方承认的国际疆界之内，其全国政府若不是虚弱、腐败，就是根本不存在。“不幸的是，在这类地区看不到什么持续改善的前景，而随着这些不稳定国家的中央政府日趋衰弱，或者说世界版图的进一步巴尔干化，武装冲突的危险性自然也会往增高的曲线攀升。”^{[101]16}在过去，武装冲突通常是国与国之间的敌对和摩擦，今天的情况已非如此。21世纪的战争不会像 20 世纪那样嗜杀，但是在这个世界的很大一块地区，武装暴力以及不成比例的伤亡和损失，依然会是四处可见的痼疾——偶尔也会蔓延成传染病。和平的前景还很遥远。

霍布斯鲍姆与《大国的兴衰》的作者、著名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是两种不同的历史学家，但对当代世界的见解上却有相通之处。保罗·肯尼迪虽然以《大国的兴衰》而名扬世界，但他在近二十年前出版的《未雨绸缪：为 21 世纪做准备》，却对当代世界所面临的困境有惊人的理解。他在为这本书的中文版撰写的序言中说，全球人口爆炸（以及环境问题的压力）与全球的技术爆炸之间的竞赛，是后者减缓前者的压力，还是被前者压倒，是当今政治中最为重要的一个长远因素。他认为 19 世纪的英国和 20 世纪的日本是通过技术上的进步找到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的。肯尼迪写出《未雨绸缪：为 21 世纪做准备》，把影响当代世界诸多跨国界问题展现出来。按照他自己的说法，这本书在主题和结构上与《大国的兴衰》完全不同，但关心的问题和写作目的却密切相关。两本书都是要写戴维·兰德斯（David S. Landes）所说的“大历史”。^[11]

7 同为历史学家，美国日裔学者入江昭却比霍布斯鲍姆和保罗·肯尼迪对世界持有更为乐观的看法。他的《全球共同体——国际组织在当代世界形成中的角色》认为，国际组织或全球共同体在当代人类生活和国际政治中日益重要，它们和民族国家暨国际体系是同时存在的，相互影响，并在某种情况下相互重合。冷学者们过于专注高层政治和以国家为中心的活动，忽略了其他诸种现象，而这些现象能够更好地解释当代世界的形成。他指出，冷战的缓和与最终的结束被视为国际关系的核心主题，它们开启了被称做“后冷战时代”的新时代的大门。但是，这些用语只是看到了国际事务的一个方面，不能帮助我们理解其他方面的发展，这些发展与柏林墙的坍塌和苏联解体这样的戏剧性事件同等重要。除了将这些事件放在冷战史的框架下加以理解外，我们还可以将其视为非地缘政治发展的某个重

多大规模的历史事件似乎一起在这个时代达到了发展的顶峰。^{[13][170]}这似乎可以说明我们为什么要把当代世界的解读作为思考问题的一个起点。

三、当代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观”

国际学术界左翼学者对当代世界的解读也非常具有启发性。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在这个方面具有广泛影响。他的世界体系理论和关于美国实力衰落的观点在学术界广为流传。他认为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世界格局进入了大变迁的时代，并以此预见作为世界格局一极的美国将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谈到世界的前景，沃勒斯坦认为当今的世界处于三种相当不同的地缘政治割裂之中：美国、欧盟、日本之间，南北之间或核心地区与其他地区之间以及达沃斯与阿雷格里港精神之间。^{[14][251]}“世界的前景如何？答案是不确定的。但可以相当肯定，我们大家作为个人或集体，对未来发展的影响力会比我们想象得要大，这是因为我们生活在过渡时代，生活在动乱的爆裂时代，生活在选择的时代。”^{[14][270]}

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社会学教授威廉·罗宾逊（William I. Robinson）认为，“我们生活在一种全新的全球体系即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之中”^{[15][2]}。他的《全球资本主义论：跨国世界中的生产、阶级与国家》着重关注“作为全球化核心的两大重要的结构性进程：跨国资本家阶级（transnational capitalist class, TCC）的崛起和跨国国家（transnational state, TNS）的出现”，提出世界经济向全球经济的过渡构成了世界资本主义历史上的划时代转变，但不是自身的断裂或中断。今天我们正处于资本主义第四阶段，即全球化的初期，其标志一方面表现为技术上的芯片化和计算机化（“信息时代的符号”）；另一方面则在政治上表现为20世纪社会主义建设尝试的崩溃，以及试图提出一个取代世界资本主义模式的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整整一代人的失败。^{[15][7]}在经济大波动的背后，世界资本主义从民族国家阶段——各自拥有不同的体制、组织、政治和管理结构——向跨国阶段过渡。资本的全球流动既改变了民族国家和资本积累的关系，又改变了阶级关系。在当前正在发生的跨国阶级形成的过程中，民族国家所发挥的协调作用得到了变更，全球阶级结构正凌驾于国家阶级结构之上。随着国家的生产结构日益跨国融合，那些通过民族国家而得以发展组织结构的世界阶级正经历着与其他国家的“国内”阶级进行超国家融合的过程。全球阶级的形成包括世界日益分裂为全球资产阶级和全球无产阶级。^{[15][54-55]}

罗伯特·W·考克斯（Robert W. Cox）在其早年的论著中认为，生产关系、阶级和历史集团的组合并不孤立地存在于各个国家之内，而是与世界秩序相连。“现代史上历次世界秩序之间有着重大的质的不同和结构上的分别。若是认为由于所有国家的国家间制度都缺乏一个至高无上的世界级权威，因而它们实质上似乎都是相同的，那就是把问题过分简化，会造成理解上的失误。”^{[16][12]}世界秩序间的主要区别在于某种秩序是否具有霸权性。霸权性的世界秩序的运行依照普遍的原则，主导国中的社会阶级与其他国家中相应的阶级结为同盟，作为各国国家基础的历史集团通过各国社会阶级的共同利益和共同的思想观点而联系起来，形成全球性的阶级。在非霸权性世界秩序的趋势则是反其道而行之，社会阶级和生产的结构以国家为中心。

四、当代世界解读中的几个问题

当代世界的不同解读也碰撞了相同的问题。这些问题或许是我们理解当代世界的关键，深入地讨论这些问题对我们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发展中国家的构建问题 在全球化的冲击之下，我们一方面看到国家权力的相对缩减和让渡，对于全球化条件下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苏珊·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甚至表示，她先前的代表著《国家与市场》应改成《市场与权威》，因为在安全、生产、金融 and 知识四种权力结构中，国家仅仅在安全结构中扮演主角。如果国际政治“只把国家

作为分析单位，只把国家组成的国际社会视为关注的主要问题领域，我对国际政治的特殊兴趣也就没有了^{[17]6}。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全球化的冲击之下经济与社会发展陷入困境。冷战期间东西方竞争和对抗条件下所掩盖的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国家构建问题，在冷战结束后逐渐显露出来了。霍布斯鲍姆对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不屑一顾，但他在观察当今世界的时候和弗朗西斯·福山一样，也对冷战结束后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纷乱忧心忡忡，甚至也把当今世界上的国家大致分成了两类。实际上，相同的观察也出现在不同的学者视野之中。德国学者赫尔弗里德·明克勒（Herfried Münkler）写道：冷战期间，无论苏联还是美国都不遗余力地干涉第三世界国家的内政，维持着它们的稳定，因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些国家的危机都没有表现出来。冷战结束后，美国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兴趣荡然无存，许多50年代和60年代成立的国家陷入困境之中。^{[18]141}福山未等他“历史终结论”的争论终结，就发表了题为《国家构建：21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小册子，提出国家构建是当今国际社会最重要的命题之一，因为软弱无能国家或失败国家已经成为当今世界许多严重问题（从贫困、艾滋病、毒品和恐怖主义）的根源。国家弱化问题既是一个国家又是一个国际性的首要问题。他甚至认为已遭人唾弃的“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本身并没有错，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机构在许多情况下曾是经济增长的障碍而且只能通过经济自由化得到最终解决。^{[19]1-5}“真正的问题在于国家在某些领域必须弱化，但在其他领域却需要强化。”^{[19]5}我们不一定认同福山提出的国家构建的解决方案，也不一定相信事情像明克勒描绘的那样糟糕，但我们无法回避的是当代世界把相当一批还没有来得及完成现代国家构建任务的国家和地区拖入到全球化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的竞争环境中来了。这些国家的走向对当今世界，包括对正在与世界融为一体的中国具有重要影响。

全球共同体问题 《世界是平的》刻画了人类社会有史以来第一次在一个平台上生存的场景，全球共同体无疑是题中应有之意。《帝国》所刻画的帝国形态无疑也是一种全球共同体的形态。入江昭则把国际组织特别是非国家组织作为当今世界形成的重要推动力量和组成部分。但威廉·罗宾逊则刻画了另一幅全球共同体的场景：跨国家阶级的形成和资本主导下的超国家形态的出现。无疑，无论从哪个角度分析，全球共同体都具备了形成的条件，但这个共同体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则是正在逼近当今世界的一个选择。实际上，布热津斯基早就开始谋划一个由美国主导的全球共同体了。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在他《大抉择：美国站在十字路口》一书中表示：“美国的力量和美国的社会发展动力结合在一起，将可能促使逐渐形成一个利益共享的全球共同体。^{[20]序言,1}“要害问题是：美国是打算在利益分享的基础上塑造新的全球体系，还是打算运用它强大的全球力量首先扩大自己的安全。”^{[20]4}考虑到美国在世界上扮演着两种矛盾的角色，美国命中注定要么做全球共同体的催化剂，要么做全球大混乱的催化剂，何去何从，美国人肩负着独特的历史重任。他认为：“美国可以催生一个开放的全球体系，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又可以制定该体系的规则，并根据自己的意愿决定美国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该体系。”^{[20]162-163}布热津斯基特别提到了中国。他认为：“有点自相矛盾的是，能够损害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主导地位的，正是中国对全球化的接受，而不是对它的拒绝。”^{[20]177}实际上，“全球共同体”问题首先是一个转型中世界秩序诸多因素的博弈问题，特别由于非国家因素的作用增强和新兴大国的崛起而超越了人们原来的思路和逻辑，在不同人的理想和现实中间前行。

新兴大国问题 “他者”的崛起实际上更主要的是当今世界如何接受和塑造新兴大国问题。在这之中，中国和印度又是最受世界关注的。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的《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把对中国崛起的讨论推到了顶点。他认为中国的崛起预示着一种全新的国际秩序的诞生，标志着西方民族国家在全球主导地位的终结，同时也表明一个运用多种不同方式塑造的新型世界的崛起。^[21]实际上，关于“中国的崛起”和“中国世纪”的报道和评论更是经常见诸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报纸和杂志。但是，对这种言论持

